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中国统计学会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主办

A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Statistical Society of China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Sciences of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统计研究

STATISTICAL RESEARCH



3 . 2023 第40卷
总第378期

编辑委员会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白仲林	曹显兵	陈建宝	陈浪南	陈梦根
陈松蹊	程维虎	方匡南	房祥忠	冯建峰
冯兴东	高敏雪	高艳云	郭建华	韩兆洲
杭斌	洪兴建	贾怀勤	贾尚晖	姜万军
蒋萍	金勇进	金玉国	雷钦礼	李宝瑜
李金昌	李静萍	李腊生	李正辉	林建浩
刘建平	刘立新	陆军	罗良清	吕光明
欧阳资生	潘文卿	庞皓	平卫英	钱雪亚
邱东	施建军	石磊	史代敏	宋旭光
苏为华	唐年胜	唐晓彬	王美今	王晓军
王亚菲	王兆军	吴喜之	向书坚	肖红叶
徐国祥	徐强	徐映梅	许宪春	许永洪
杨灿	杨再贵	杨仲山	姚方	袁卫
曾五一	张涤新	张日权	赵彦云	周国富
朱建平	朱启贵			

主 编: 阎海琪

常务副主编: 赵军利

编辑部负责人: 于洋

本期执行编辑: 王映雪

法律顾问: 北京市汉达律师事务所 郑光远律师

主管单位: 国家统计局

主办单位: 中国统计学会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编辑: 《统计研究》编辑部

出版: 《统计研究》编辑部

地址: 北京月坛南街75号

邮政编码: 100826

电话: (010) 68783961

投稿网址: <http://tjyj.stats.gov.cn>

电子信箱: tjyj@stats.gov.cn

印刷单位: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 北京市邮政局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政局

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2-4565

CN 11-1302/C

定 价: 35.00元

本刊已入编“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和“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不再另行发放。作者如不同意将文章入编,投稿时敬请说明。投稿人对稿件、图片内容责任自负。如因有侵犯他人版权而引起各类法律纠纷,本刊不承担连带责任。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

国家统计局统计违法行为举报电话(010-68512113)和电子邮箱(fgjc@stats.gov.cn)。

《供需双循环测度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基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特征构建了一个理解双循环的分析框架,从企业间中间产品供给循环和对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循环视角测度了我国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循环,并通过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探究了双循环视角下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显著特征。供给端双循环中,内资企业间循环是纯国内循环的主体,其次分别是内外资企业间循环和外资企业间循环;需求端双循环中,国外对国外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仅次于我国对内资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国内循环发挥了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作用,内外资企业间循环和我国对内资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势在必行。《我国省域新经济新动能:统计测度、空间格局与关联网络》从数字能力等5个维度构建新经济新动能综合指标体系,测算我国31个省份的新经济新动能指数,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考察省域新经济新动能的空间关联强度,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呈现新经济新动能关联网络的整体形态、内部结构与演进态势。结果显示,我国省域新经济新动能呈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先收敛后发散的动态趋势,形成以“高一高”和“低—低”聚集为主的空间格局;地区之间的新经济新动能联系东密西疏,省域新经济新动能的对外辐射和吸纳能力逐步提升。

多人口随机死亡率模型是人口统计和保险精算领域的前沿问题。《我国人口死亡风险异质与混合模型研究》从我国人口死亡风险异质性检验出发,构建两性别人口死亡率联合预测的混合泊松公因子模型,对男男女女两性别人口死亡率进行联合建模和预测,用于对保险公司养老长寿风险资本需求测算。研究表明,混合泊松公因子模型能够有效刻画人口死亡风险的异质性,提升模型拟合优度,有效避免传统模型低估人口死亡率改善的弊端,并且死亡率性别比变动趋势符合人类生物规律。

统计研究

STATISTICAL RESEARCH

第 40 卷第 3 期

(总第 378 期)

2023 年 3 月 25 日出版

目 录

供需双循环测度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	侯俊军等 (3)
我国省域新经济新动能: 统计测度、空间格局与关联网络·····	程开明等 (18)
城投债信用风险传染的地理集聚、路径演变与驱动机制	
——基于前沿弹性网络收缩技术的研究·····	王姝黛等 (32)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关联是否加速了制造业区域转移? ·····	陈丽娴 (43)
契约不完全、所有制差异与国内制造企业垂直并购机制·····	蒋含明等 (56)
新发展格局下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来自我国 25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王智新等 (71)
东道国制度环境、市场规模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半参数变系数空间面板模型 ·····	刘 玉等 (85)
信息不对称下成交量与波动率关系建模与统计推断·····	彭 烨 张志远 (100)
地区信任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基于区域经济互动的视角·····	李建成等 (114)
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就业: 替代还是互补?	
——基于 22 个经济体数据的经验分析 ·····	郑丽琳 刘东升 (126)
我国人口死亡风险异质与混合模型研究·····	赵 明 王晓军 (139)
人口普查中行业和职业编码智能化	
——国际经验与中国进程·····	孙望书 孙 旭 (151)

STATISTICAL RESEARCH

Vol. 40, No. 3 (Series No. 378)

CONTENT

- The Measurement of Supply and Demand Dual Circulation and China's Steady Economic Growth Hou Junjun et al. (3)
- China's Provincial New Economy and New Impetus: Statistical Measurement, Spatial Pattern and Association Network Cheng Kaiming et al. (18)
-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Path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for Credit Risk Contagion of Municipal Investment Bonds: Analysis Based on Elastic Net Shrinkage Wang Shudai et al. (32)
- Does Spatial Connectivity of Producer Services Accelerate Regional Transfer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en Lixian (43)
- Incomplete Contract, Ownership Difference and the Mechanism of Vertic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Chinese Manufacturers Jiang Hanming et al. (56)
- The Impact of Urban Digital Financ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256 Cities in China Wang Zhixin et al. (71)
- Host Countrie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Market Size and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Semi-parametric Varying-Coefficient Spatial Panel Model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Liu Yu et al. (85)
- The Modelling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 of Volume-Volatility Relation und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Peng Ye & Zhang Zhiyuan (100)
- Regional Trust and Super Large-scale Market: Based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raction Li Jiancheng et al. (114)
- Robot Application and Labor Force Employment, Substitution or Complementation: Evidence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22 Economies Zheng Lilin & Liu Dongsheng (126)
- Study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Population Death Risk and Mixed Mortality Model in China Zhao Ming & Wang Xiaojun (139)
- Research on Automated Coding of Industries and Occupations in the Population Censu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the Process in China Sun Wangshu & Sun Xu (151)

地区信任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基于区域经济互动的视角

李建成 陈强远 程 玲 黄丹蕾

内容提要：在加快推进国内大循环的情境下，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关系到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建立。针对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的问题，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数据库、我国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库等数据构建的微观匹配大数据，从贸易、生产、投资和研发合作4个维度检验了地区信任对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间的信任水平提升能显著提高被信任地区企业成为对方贸易伙伴、上下游主要供应商、被投资企业以及研发合作伙伴的概率，从经济合作网络层面推进了区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本文从文化经济学视角切入拓宽了信任问题研究范畴，为如何打造统一大市场提供了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的思路和证据。

关键词：信任；区域互动；贸易关系；生产网络

DOI: 10.19343/j.cnki.11-1302/c.2023.03.009

中图分类号：F061.5, F727, F7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565(2023)03-0114-12

Regional Trust and Super Large-scale Market: Based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raction

Li Jiancheng Chen Qiangyuan Cheng Ling Huang Danlei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eeding up the promotion of domestic economic circle,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large market in China is importan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uper large-scale market advantage. The paper tests the impact of trust as an inform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n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domestic large market, from the views of trade, production,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micro matched big data of World Bank surve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nation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 registration, annual reports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 patent data of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rust between region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robability of trusted regional enterprises becoming trading partners,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uppliers, 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R&D partners. The trust between regions indeed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unified large market from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network. 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tru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nomics and provides ideas and evidence for building a unified large market with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 of trust.

Key words: Trust; Regional Interaction; Trade Partnership; Production Network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迈向高质量的中国城市技术创新：测度、机理与效应”（7207309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学者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城市间合作式创新网络结构与空间互动机理研究”（2022RC098）；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面上项目“技术创新质量的微观测度与提升机制设计”（21XNA008）。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逆全球化趋势显现，部分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加之世纪疫情、大国博弈与地缘冲突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了巨大冲击，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突出。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因此，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立统一大市场，有效挖掘和激发强大内需潜力，是我国现阶段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破解发展困境的必要举措。

对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影响，区域政策、体制机制、宏观战略等正式制度因素是至关重要且最为直接的（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陆铭和陈钊，2009）。为消除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等，各行政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以建设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地方保护和区域封锁的现象逐渐减少。但也必须看到，国内市场的实际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地区之间的贸易、投资、创新等方面的本地化特征仍然明显，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活动范围并未扩大。这引发本文进一步思考：正式制度并未完全消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可能被忽略了。

现有文献发现方言壁垒、基因差异等非正式制度对地区间隐形壁垒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丁从明等，2018；林建浩等，2018），但这些因素不能很好地反映转型经济体特征，更适合反映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体。我国作为高速发展的转型经济体，市场经济秩序存在相对滞后和不完善等问题，突出表现为信任危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和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张维迎，2001），社会信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不完全契约、起到维持商业契约完整和持续的替代作用（刘凤委等，2009）。因此，从社会信任视角来阐释我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困境，是洞中肯綮且恰如其分。

对此，本文重点关注社会信任如何助推以企业经济互动行为为代表的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完善。本文首先检验了不同地区间信任水平差异如何影响企业对上下游贸易（生产）伙伴的选择。其次，除了上下游的贸易（生产）网络外，跨区域的资本流动和创新网络也是区域经济互动不可或缺的核心特征。对此，本文也分别基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数据库和我国发明专利数据库，计算了地区间投资和创新合作的互动程度，进一步佐证信任环境对以企业间投资和合作式创新密度为代表的统一大市场形成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信任的形成是社会认同发生作用的过程，熟悉与频繁的接触都推动了更深层次的信任（Coleman，1990），这不仅是一种经验认知的加强，还包括经济行为主体的情感偏好。因此，信任具有社会性，是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更是引导人们理性行为、生成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社会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大量研究从社会信任的界定、组成、运行机制、社会效应等方面进行考察。此外，经济学界也开始关注社会信任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社会信任无论是作为对其他个体行为的一个共识亦或是具有不同期望或信念的偏好，都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交流成本、完善合同契约执行、激励主体分享收益、停止针锋相对的敌意行为等方式提高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运行效率。信任也代表了群体的地区声誉和地区质量（McEvily等，2002）。现有关于信任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社会信任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包括方言（黄玖立和刘畅，2017）、人口流动（吕炜等，2017）、公共资源（史宇鹏和李新荣，

2016)等;二是社会信任引致的经济效应,如企业并购绩效(王艳和李善民,2017)等。本文的贡献侧重在第二方面,即拓展了社会信任引致的经济效应研究。

进一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综述社会信任引致的经济效应研究。第一,社会信任会影响微观企业的经营决策活动。Bloom等(2012)利用跨国公司数据发现跨国公司和下属公司所属地方的双边信任程度更高,则有利于跨国公司总部对下属公司给予更多自主权力,进而提高生产率水平;Bottazzi等(2016)发现双边信任水平增加了风险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概率;曹春方等(2019)认为地区间信任会通过降低异地交易成本和集团组织成本负向和正向影响企业集团异地发展;Wu等(2014)发现位于高信任地区的私企更容易获得信贷,尤其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的地区更加明显,这说明信任可以作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替代机制。可见,在塑造地区比较优势方面,信任的重要性不亚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

第二,社会信任也会影响双边区域的宏观经济互动。Guiso等(2009)检验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双边信任对双边贸易、外国直接投资(FDI)以及证券组合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双边信任能显著促进国家间双边贸易和投资。Xing和Zhou(2018)探讨了省际双边信任与我国各省份间总体双边贸易量的关系,发现信任显著促进了省际贸易。但区域间贸易总量上的影响无法剖析贸易微观过程如何发生,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所得的企业最大供销商区位和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①(CSMAR)中我国200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所得的企业前5大主要供销商区位,可以给出更为可靠且更为微观的关于企业跨地区生产伙伴区位以及相应份额信息(上、下游之间的贸易),能够更为细致地剖析软文化实力对双边市场互动的经济效应,补充现有研究的不足。

本文采用企业生产网络的整合与优化来代理统一大市场。随着企业生产网络大数据的可得,经济学对企业生产网络的关注近年愈发密切,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展开。理论层面,Bernard等(2019)通过数理模型证明搜寻成本和外包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企业在更远距离搜寻到更多且具有更高质量的生产伙伴,降低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继而提供企业绩效。Bigio和La'O(2020)通过数理模型证明生产网络决策的扭曲能够通过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劳动税楔影响宏观经济。实证层面,主要围绕不同因素如何作用于搜寻和交流成本继而影响企业的匹配行为及其经济结果。Fort(2017)发现引进信息通信技术,可以降低协调成本,致使企业生产线的分解,并引致更多外包活动,提升对外国生产伙伴的匹配程度。Bernard等(2019)利用日本高铁修建和企业生产网络数据研究发现,高铁对降低搜寻成本和外包成本具有显著作用,并提升了高铁邻近企业间的匹配质量。饶品贵等(2019)利用我国数据实证发现,高铁开通后企业的生产伙伴平均地理距离明显提升。在经济效应上,企业生产伙伴的创新则显著影响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当生产伙伴在地理距离上越近、创新能力越高时,企业所受到的技术溢出更为显著(Chu等,2019)。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首次从社会信任的视角出发,基于文化经济学框架探讨了我国国内统一大市场整合的非正式制度成因,较好地弥补现有理论在解释我国市场分割时的不足;第二,基于综合性微观大数据,从贸易、生产、投资和研发合作这4个维度切入,为实证检验地区信任对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提供了全面的微观证据;第三,采用“企业—地区”的两两匹配的计量设计,使得能在同时控制已有研究所强调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更好地识别地区信任对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因果效益。因此,本文为各地区切实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地区

^①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涵盖宏观、行业和中国证券等经济金融主要领域的高进准研究型数据库,网址:<https://cn.gtadata.com/>。

名片并提高软实力，提供了可行的实施路径和理论支撑。

三、模型、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界定是复合多元的，对其全面测度也较为复杂。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如何界定和测度“统一大市场”，而是检验社会信任如何影响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为此，本文从区域间市场经济活动出发，从贸易、生产、投资、研发等维度的区域互动来表现市场统一的程度。在基准回归部分本文主要基于贸易伙伴维度，对信任如何影响跨区域伙伴选择进行检验，而将生产、投资、研发等的检验放在拓展分析部分。

（一）模型设定

当不存在市场分割或个体偏好时，选择与谁进行贸易是随机的。而当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导致市场分割或个体偏好出现时，贸易则变得非随机。当因不信任导致本应属于可贸易对象的群体被排除在选择集之外时，统一的大市场被分割了；反之则反。为了研究社会信任水平如何影响企业对贸易伙伴选择的偏好，本文设定如下双边模型：

$$P(\text{Partner}_{ic,p(j)} = 1) = \Phi(\alpha \text{Trust}_{p(i),p(j)} + \mathbf{Z}\beta + \mathbf{X}\gamma + \mathbf{R} + O_c + D_p + \varepsilon_{icp(j)}), p(i) \neq p(j) \quad (1)$$

其中， $\text{Partner}_{ic,p(j)}$ 表示企业*i*的份额占比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否在省份 $p(j)$ ，是则为1，否则为0； $\text{Trust}_{p(i),p(j)}$ 为企业*i*所在省份 $p(i)$ 与其最大销售伙伴*j*所在省份 $p(j)$ 之间的群际信任水平； O_c 为企业所在城市的固定效应， D_p 为企业最大销售伙伴的省份固定效应。 \mathbf{Z} 、 \mathbf{X} 和 \mathbf{R} 分别表示企业特征向量、省份特征向量和双边贸易成本， $\varepsilon_{icp(j)}$ 为误差项。此外，对模型（1）也进行线性概率（LP）估计，且给出“企业所在地-贸易伙伴所在省”维度的聚类标准误。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涉及贸易伙伴、生产伙伴、投资和研发伙伴4个维度的企业信息，分别在各实证环节中予以回归。

（1）贸易伙伴：企业跨区域贸易伙伴区位。使用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①（ICS，2005），该调查报告的问题j32描述了“在您本省份之外，哪个省份是您最大销售商或供应商所在地”，并提供了“是否在外省有最大贸易伙伴以及有的情况下的省份代码”。该份数据在高超等（2019）等文献中运用，本文将其作为基准回归被解释变量。

（2）生产伙伴：企业生产网络信息。CSMAR数据库中200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披露了上市公司前5位主要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等数据信息，本文据此整理得到上游供应商名称、采购额、采购额占比、下游客户名称、收入额以及收入额占比等多项指标。

（3）投资：企业跨区域投资信息。在我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数据库^②提取2000—2015年我国所有企业的法人股东和股权信息，并基于企业地理位置整理汇总得出2000—2015年我国城市间的企业投资信息，用以反映城市间资本流动的信息。

（4）研发伙伴：企业跨区域研发合作伙伴区位信息。使用2000—2015年我国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库与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微观企业数据库匹配，得到二次经济普查涵盖的所有企业历年跨地区专利合作信息，包括加总到每个城市配对层面的历年合作专利总量、合作企业总数量。

①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为世界银行对我国企业做的抽样调查，通过与企业高管面对面访谈交流等方式获取企业相关信息，网址：<https://microdata.worldbank.org/index.php/catalog/602>。

②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数据库信息全部来源于各级主管部门和税务、质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各级机构信息，平台可以查询对企业的资质、信用情况等评估信息，网址：<http://qgxy.org/>。

2.解释变量：地区间双边信任水平。地区间的双边信任数据来源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全国进行的问卷调查^①，根据收集到的问卷信息，借鉴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的计算方法得到地区加总信任水平数据。本文具体整理出以下三类核心解释变量：各省份之间信任水平（群际信任），各省份对其他省份的信任排序（信任越高排名越高），各省份的第一信任省份（排名最高的省份）。该份数据在刘凤委等（2009）、Xing和Zhou（2018）等文献中运用，具备一定的可靠性和解释力，同时该数据也是衡量我国地区间信任水平的唯一来源。

3.控制变量。企业特征向量（ Z ）包括：企业年龄，用2005年减去企业成立年份来衡量；企业规模，定义为2002—2004年总就业人数的年度平均值；企业资本劳动比，定义为2002—2004年固定资产净额与总就业人数比值的年度平均值；企业生产率，定义为2002—2004年主营业务收入与总就业人数比值的年度平均值；企业所有制形式，引入了是否国有企业、是否外资企业这两个虚拟变量（若是则取值为1，否则为0）。目的省份特征向量（ X ）主要用于考察销售伙伴区位市场规模等因素对企业贸易伙伴选择的影响，包括目的省份GDP、人均GDP和人力资本水平。其中，人力资本水平采用6岁以上受教育人口按教育程度加权求和计算得出，数据来自于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贸易成本（ R ）为企业 i 所在城市 c 到最大销售伙伴所在地的省会城市的球面距离（取对数）。

由于直辖市有着不同于其他省份的特殊经济政治地位，且直辖市的受信任水平也远高于其他省份，同时也最不信任其他省份（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因此，在回归中均剔除了来源地为直辖市的企业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来源地企业特征变量	企业年龄（对数）	144016	2.2812	0.8012	1.0986	7.6024
	企业规模（对数）	144016	5.6862	1.4644	1.7918	12.5955
	企业劳资比（%）	143978	3.9517	1.2400	0	11.6013
	企业生产率（%）	143978	5.2555	1.1283	0.6593	12.7749
	是否国企（0/1）	144016	0.0901	0.2864	0	1
	是否外资（0/1）	144016	0.1005	0.3006	0	1
目的地省份特征变量	目的省份GDP（对数）	144016	3.6575	0.3353	2.6010	4.2060
	目的省份人均GDP（对数）	144016	4.1024	0.2480	3.5750	4.6049
	目的省份人力资本（对数）	144016	2.7448	0.6097	1.7702	4.4015

四、基准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估计结果

对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Panel A为线性概率模型（LPM）估计结果，Panel B为离散选择模型（Probit）估计结果。发现LPM与Probit估计结果都显著为正。为方便分析，本文重点讨论LPM的估计结果。列（1）为仅控制企业所在地城市和行业固定效应、在不区分目的地省份差异情况下的估计结果，企业所在地与目的地间群际信任程度每上升1%，在该目的地匹配到最大销售伙伴的概率提升4%，且在1%水平下显著。列（2）在列（1）的基础上控制企业特征和双边距离，结果显示，系数尽管变小但仍显著为正，说明双边距离和企业特征对企业外部销售伙伴区位选择存在一定解释力。

^①通过向全国企业和企业家（包括董事长、经理、厂长等）发放问卷，调查其对各地区的企业守信用程度的评价。调查对象中涉及的国有企业占样本量的38%，集体和私营企业及股份合作制企业占19.8%，股份制企业占34.1%。

表2 群际信任与最大贸易伙伴区位选择					
变量	(1)	(2)	(3)	(4)	(5)
Panel A: LPM估计					
群际信任	0.0374*** (0.0022)	0.0289*** (0.0017)	0.0316*** (0.0025)	0.0170*** (0.0032)	0.0173*** (0.0043)
Adj.R ²	0.0250	0.0463	0.0531	0.0609	0.0651
样本量	144016	143978	143978	143978	121359
Panel B: Probit估计					
群际信任	0.0302*** (0.0015)	0.0231*** (0.0012)	0.0168*** (0.0018)	0.0109*** (0.0028)	0.0072*** (0.0026)
Pseudo. R ²	0.0576	0.1071	0.1335	0.1292	0.1421
样本量	144016	143978	140854	140854	140854
双边距离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企业特征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目的省份市场规模	No	No	Yes	No	No
来源地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o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目的地省份固定效应	No	No	No	Yes	Yes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括号中为在城市-省份配对组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列（3）在列（2）的基础上控制目的地省份特征变量，系数仍然显著。列（4）将控制目的地省份特征变量改为控制目的地省份固定效应后，估计系数相比列（3）有所降低，表明更多的目的地市场的不可观测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且目的地省份固定效应相比可观测市场特征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进一步，重点比较列（2）、列（4）和列（5）的估计结果。列（2）仅控制企业所在地城市固定效应，列（4）仅控制目的地省份固定效应，列（5）同时控制了这两者。结果显示，列（2）与列（4）和列（5）的系数差异较大，而列（4）与列（5）的系数则基本无差异，表明信任对最优销售伙伴区位的影响受到目的地驱动而非来源地驱动，这也反映了不同区位企业在合作能力与匹配能力上的差异（Bernard等，2019），即相比企业本身固有的外部搜寻倾向或偏好（合作能力），谁更值得合作或者能够匹配到谁更加重要（匹配质量）。

（二）稳健性检验

1.基于工具变量（IV）的估计结果。本文利用姓氏距离作为地区信任的工具变量。我国姓氏源远流长，自夏商以来列土分封、定基姓氏，一姓一族正式形成。自汉以来，撰修家谱、族谱、祠谱、墓志以寻根溯源。北宋著《百家姓》，罗列天下姓氏编订成典。总体来看，我国姓氏渊源与分布格局具有以下典型特征：首先，姓氏衍变的背后反映的是文化与血缘传承，不同姓氏之间反映的是文化与血脉传承的差异；其次，姓氏在纵向分布上具有不平衡性，具不完全统计，“李”“王”“高”等100个姓的人口占我国人口总数的85%，“小姓氏”的人口占比非常低；最后，姓氏分布格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移民的轨迹，如江浙一代“金”姓大多由北方满族、朝鲜族、金族等少数民族迁徙而来。姓氏是血缘传承的宗族印记，而地区间的姓氏距离反映了地区群体间的血缘传承等在历史活动下的差异格局。利用Du等（1992）的方法和中国科学院的姓氏分布数据，依据下式计算出各区域间相对姓氏距离：

$$SubnameDis_{ij} = \sum_{k=1}^S Sn_{ik} Sn_{jk} / \sqrt{\sum_{k=1}^S Sn_{ik}^2 \times \sum_{k=1}^S Sn_{jk}^2} \quad (2)$$

其中, Sn_{ik} 、 Sn_{jk} 分别为抽样样本中省份*i*、*j*的姓氏*k*的人数占抽样总人数比例, S 是姓氏的总数量, 而 $\sum_{k=1}^S Sn_{ik} Sn_{jk}$ 则是两省之间绝对姓氏距离。IV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列(1)~(2)估计结果, 在控制信任水平后, 姓氏距离估计系数不显著, 表明姓氏距离唯一通过地区间信任继而影响贸易伙伴选择, 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要求。第一阶段结果表明, 姓氏距离对地区间信任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弱工具识别检验统计值超过10, 无弱工具变量问题。列(3)结果表明, 工具变量识别下的群际信任对企业最优贸易区位选择的影响仍显著为正, 且各项系数均高于结果变量均值, 表明本文估计结果具有统计和经济双重稳健意义。

另外, IV估计结果大于OLS 6倍左右, 略大于Guiso等(2009)利用欧洲数据得到的4倍差异。OLS估计存在向下偏误, 具体原因可能包括: 第一, 存在遗漏变量与误差项负相关。一个明显的遗漏变量是历史变迁下的地区间文化差异。信任是一个带有历史痕迹和文化约束的社会资本, 同宗、同源等均可以影响信任, 而文化差异(如方言距离、基因差异)某种程度会同时影响地区间的商业活动往来; 第二, 关于双边信任水平的测量误差。基于问卷的信任测量对真实信任而言, 是一个存在噪音的测量, 当变量带有误差时, 估计系数的增加也意味着误差标准差的衰减(Guiso等, 2009)。

表3 工具变量外生性识别及其两阶段估计

变量	工具变量外生性识别OLS		IV-2SLS	
	(1)	(2)	(3) 第二阶段	(4) 第一阶段
群际信任		0.0159*** (0.0036)	0.0605* (0.0342)	
姓氏距离	0.0030* (0.0017)	0.0022 (0.0017)		0.0503*** (0.0093)
恰好识别				20.401
弱势别				29.39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目的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37621	137621	137621	137621

2. 去除目的省份为直辖市的样本。直辖市因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先优势, 导致企业更倾向在这里匹配生产伙伴, 而这些地区也是被高度信任的, 这可能削弱信任的作用。因此, 本文剔除了企业的贸易伙伴区位在直辖市的样本, 回归结果见附表1列(1)~(2)。LPM的估计结果显示, 剔除目的地为直辖市后, 信任程度每增加1%, 对最大贸易伙伴选择的概率提升1.95%, 结论稳健^①。

3. 信任再度量。地区间信任水平的准确测度直接关系到识别结果。基准回归中使用双边信任的绝对值作为信任水平的度量, 下面分别使用相对信任水平、信任水平排名次序对地区间信任重新度量。

对于相对信任水平的计算, 本文将来源地-目的地间的绝对信任值, 除以该来源地对其他所有地区间的信任值总和。使用相对信任水平的回归结果见附表1列(3)~(4), 群际信任的参数估计值仍然显著为正。全样本下, 相对信任水平每提高1%, 最大贸易伙伴区位选择概率提升29.63%; 子样本下, 这一概率提升为54.72%。这一结果要比绝对信任水平的经济显著性大很多。

①因篇幅所限, 附表内容以附件展示, 见《统计研究》网站所列附件。

其次，本文按来源地对各地区的绝对信任程度排名，测度信任次序。当目的地省份为来源地省份的第一信任对象时取值为1，否则为0，以捕捉第一信任地区对贸易伙伴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见附表1列（5）~（6）：全样本下，第一信任地区相比非第一信任地区，选择最优贸易伙伴概率提升1.95%；子样本估计下，概率上升为7.62%，表现出信任次序与贸易伙伴选择次序的一致性。

4.基于我国金税工程增值税数据的验证。本文利用我国金税工程增值税数据，重新计算所得的各省相对销售伙伴顺序。该数据由2003—2005年各省区间月度的含增值税贸易数据计算而成，与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时间上一致。此外，该数据涵盖各省间贸易份额，不仅能比较信任程度对企业贸易伙伴区位选择的影响差异，也能比较信任程度对贸易伙伴份额分配的差异。为此，本文利用该数据进行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PM_Partner_{od} = \alpha GroupTrust_{od} + X_o + X_d + Z_{od} + \varepsilon_{od} \quad (3)$$

其中， $PM_Partner_{od}$ 为进口省份 d 是否为出口省份 o 的最大贸易区位，是则为1，否则为0，以及如果是，其出口份额占来源地总出口的比重； $GroupTrust_{od}$ 是出口省份 o 对进口省份 d 的信任程度； X_o 和 X_d 分别为来源地和目的地经济特征变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GDP）、地区人均GDP和人力资本水平等； Z_{od} 为双边地理距离； ε_{od} 是误差项。为方便分析，所有回归均采用线性概率模型估计，并在省份配对组层面聚类。估计结果见附表2。其中，列（1）~（2）被解释变量为省份 O 、 D 是否是最大贸易伙伴变量，列（3）~（4）被解释变量为各省 O 、 D 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份额比重。根据附表2列（1）~（4）结果，群际信任的参数估计值都显著为正，并且其值大小和基准回归的结果相差不大。根据列（2）和列（4）结果，当同时控制双边距离变量、来源地经济特征和目的地经济特征后，群际信任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095和0.2322。这表明信任程度每增加1%，群际间成为最大贸易伙伴的概率提高0.95%，最大贸易伙伴贸易份额所占比例增加23.22%。

5.当代地域偏好下的信任证据。识别的另一个挑战是：企业家对其他地区的信任是基于自身通过业务交往和频繁接触产生的个体信任偏好，还是基于当代地域偏好或偏见而形成的共同歧视？为此，本文在考虑地域偏好下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地，关于地域认知的判别方式，通过从百度贴吧《中华城市吧》中搜集到的所有关于地域或城市讨论的文本^①，包括了发帖、回复等各项内容，整理得到经济行为个体对城市的各项主观认知，构建了认知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可以将样本中城市分为“偏正面评价”（设置偏正面评价虚拟变量，正面为1，否则为0）、“偏负面评价”（设置偏负面评价虚拟变量，负面为1，否则为0）和“中性”（对该地区持中立评价）三类，结果见附表3列（2）~（6）。

在列（2）~（3）中，分别引入了偏正面评价和偏负面评价两个虚拟变量，检验目的地为偏正面评价或偏负面评价的地区群组，成为企业贸易伙伴的概率是否和其他群组存在区别。可以看出，当一个地区被更多社会个体偏好而具有更正面的评价时，在最大贸易伙伴被选择的概率明显存在优势；而偏负面评价的地域则不明显。在列（4）~（6）中，本文进一步通过分组考察了社会信任对贸易伙伴概率的影响。首先，将偏正面评价的区域剔除后，社会信任的作用在偏好中性和偏负面评价的群组中起到了显著作用；其次，将偏负面评价的区域剔除后，社会信任的作用在偏好中性和偏正面评价的群组中起到的作用更显著；最后，当所有目标区域仅限于当代地域认知为偏正面评价时，不同的信任水平仍起到显著的差异化作用，进一步证实了当代地域偏好或偏见而形成的歧视对本文结论的影响甚小。

①中华城市吧网址：<https://jump2.bding.com/f?kw=%E4%B8%AD%E5%8D%8E%E5%9F%8E%E5%B8%82&fr=home>。

五、社会信任的力量：基于统一大市场多维度的进一步考察

统一大市场的界定和测度是多维的，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检验。为此，本文进一步从生产、投资和研发合作者三个维度对社会信任的效应进行检验。

（一）基于生产维度的考察

我国地区间企业生产网络信息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生产网络数据，主要由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披露的前5位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信息整理得出，具体包括了上游供应商名称、采购额、采购额占比，下游客户名称、收入额、收入额占比，并删除了其中生产网络信息不详细、无法具体到其所在地理位置的数据条目。根据研究需要，首先，分析信任是否对企业跨地区建立生产网络关系存在正向影响。其次，企业对更加信任地区的合作伙伴，其样本期末的生产份额占比增长率也会更高。对此，本文构建如下两类变量：

$$\Delta_{ij} = Ratio_{ij,t=T} - Ratio_{ij,t=1} = \frac{Sales_{ij,t=T}}{TotalSales_{ij,t=T}} - \frac{Sales_{ij,t=1}}{TotalSales_{ij,t=1}} \quad (4)$$

$$Pattern_{i,p} = I \left[\sum_{t=1}^T Sales_{ip(j)} > 0 \right] \quad (5)$$

其中， $Ratio_{ij,T}$ 为 T 年企业 i 与生产伙伴 j 的销售份额（ $Sales_{ij,t=T}$ ）占企业 i 所有生产伙伴销售份额（ $TotalSales_{ij,t=T}$ ）的比重， $Ratio_{ij,1}$ 为样本年度初期企业 i 与生产伙伴 j 的销售份额（ $Sales_{ij,t=1}$ ）占企业 i 所有生产伙伴销售份额（ $TotalSales_{ij,t=1}$ ）的比重， Δ_{ij} 衡量了样本期末相对样本期初的供销份额占比变化。 $Pattern_{i,p}$ 为企业 i 的前5大主要生产伙伴是否在目的省份 p ，在为1，否则为0。进一步构建如下模型：

$$PN_{ip(j)} = \alpha GroupTrust_{p(i),p(j)} + X\beta + O_p + D_p + \varepsilon_{ip(j)}, p(i) \neq p(j) \quad (6)$$

其中， PN 为企业 i 在目的省份 p 的生产网络信息，包括 Δ_{ij} 和 $Pattern_{i,p}$ 两种度量，预期信任程度越高的地区间，建立生产网络连接的概率越大，供销份额占总比重上升越快。上市企业控制变量 X 包括样本期初的上市企业规模、年龄、现金持有比例、应收账款比率和产权性质等变量。 O_p 为企业 i 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D_p 为企业 j 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p(j)}$ 为误差项，标准误在省份配对组层面聚类稳健。估计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地区间信任程度每提升1个标准差，生产伙伴份额增长率上升1.31个百分点，生产联系建立概率提升2.32%。符合预期，信任程度越高的地区间形成生产伙伴的概率越高，且份额占比越高、份额占比增长率提升越快。

表4 社会信任对地区间企业上下游关联的促进作用

变量	生产联系份额增长差异 (1)	是否存在生产联系 (2)
群际信任	1.3061** (0.6119)	0.0232*** (0.0069)
上市企业控制变量	Yes	Yes
企业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生产伙伴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R ²	0.0230	0.1417
样本量	31033	31033

（二）基于投资维度的考察

社会信任更高的地区，也更容易获得企业投资，资本市场间关联会更加紧密。本文将从投资维

度考察社会信任对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地区间投资数据来自我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提供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我国各个地区和行业的全部注册企业，包含了如企业所在地、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价值等企业基本信息。由于企业股东中的自然人无法确定来源地，故仅用法人投资来度量地区间的投资活动。最终，本文整理得到2000—2015年企业之间或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所有投资活动，并将2000—2015年的所有企业间出资数据汇总到城市配对观测数据中，从而得到城市间资本流动信息。据此构建如下估计模型：

$$Invet_{c(i),c(j)} = \alpha GroupTrust_{p(i),p(j)} + X\beta + O_c + D_c + \varepsilon_{c(i),c(j)}, c(i) \neq c(j) \quad (7)$$

其中， $Invet_{c(i),c(j)}$ 为城市 $c(i)$ 和 $c(j)$ 的所有企业加总投资流量，包括了城市间投资的总笔数和投资总金额。 O_c 为投资来源地固定效应， D_c 为投资目的地固定效应。 X 同时控制了城市人均GDP、总人口数、政府教育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创新总专利数、市场化指数、公路客运量和飞机场等因素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5，无论是从投资笔数还是投资总额来看，社会信任都显著提升了地区间的投资活动。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更容易获得来自对其评价较高地区的投资，从而在投资活动中形成统一市场。

表5 社会信任对地区间企业投资关联的影响

变量	投资笔数 (1)	投资总额 (2)
群际信任	0.2161*** (0.0052)	0.8163*** (0.0162)
城市配对组控制变量	Yes	Yes
双边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R ²	0.4908	0.4226
样本量	273973	273973

注：括号中为在城市配对组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三）基于研发合作维度的考察

当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时，地区间的合作创新网络会变得更紧密，进而企业可以产出更加前沿的创新。目的地市场合作研发企业也可以为来源地企业提供当地市场技术创新的前沿以及产品质量更新的市场信息。研发合作网络也会在目的地和来源地之间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有利于技术溢出与信息扩散。

本文采用企业间的专利共同授权数衡量企业研发网络。如果一个专利被多家企业共同持有，那么定义这些企业结成合作关系，所有合作关系组合在一起形成企业研发网络。如果多家企业分属不同区域，则研发网络的深化也代表着区域间共同大市场厚度的加深。专利共同研发数据采集于我国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库。本文整理出两个关键变量：一是企业来源地城市与各省份间参与研发网络的企业合作对数量；二是企业来源地城市与各省份间共同研发专利总量。构建如下模型：

$$MatchFirm_{c(i),c(j)} = \alpha Trust_{p(i),p(j)} + X\beta + O_c + D_c + \varepsilon_{c(i),c(j)}, c(i) \neq c(j) \quad (8)$$

其中， $MatchFirm$ 为地区间研发合作活动，分别采用两个城市之间进行研发合作的企业对数和双边企业共同持有专利总量衡量。其他变量和固定效应控制方法同模型（7）。估计结果见表6，双边城市所在地区间信任程度每增加1%，共同研发合作总绩效增加26.28%，双边参与研发合作企业对数增加23.32%，且统计性均显著。社会信任显著促进了地区间研发网络的形成与深化。

表6 社会信任对地区间研发网络的影响

变量	研发合作专利总量 (1)	研发合作企业数 (2)
群际信任	0.2628*** (0.0707)	0.2332*** (0.0511)
城市配对组控制变量	Yes	Yes
双边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R ²	0.6883	0.7499
样本量	106087	106087

六、结论和政策启示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建立，依赖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本文从地区间信任视角出发，基于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2005）、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我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数据库和我国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库等企业大数据信息，探讨了地区间信任如何有效推进企业跨区域贸易、生产网络、创新网络以及投资活动等行为的最优决策与空间选择优化，从而助推形成有效内循环的统一大市场。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地区间绝对群际信任水平每增加1%，企业在目标区域选择最大生产伙伴的概率增加1.7%，相对群际信任水平每增加1%，选择概率增加29%。企业的第一信任地区相比非第一信任地区，最大生产伙伴区位选择的概率增加2%。第二，通过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公布的前5大生产伙伴信息，发现地区间信任不仅增加了上市企业在目标区域生产伙伴关系建立的概率，也提高了信任地区生产伙伴的期末份额占比；通过我国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数据库计算得出地区间企业资本流动，发现地区间信任显著提高了企业在更信任区域的投资笔数以及投资总额；通过我国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库计算得出不同地区间企业创新合作专利数据，发现地区间信任显著提高了企业在更信任区域的合作企业数量和合作专利总量。

基于我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与人文地理关系的演变，区域大市场的形成与推进应充分考虑地区间的互信。双边的高信任水平可以维持稳定且高效的经济合作关系。地区间信任是地区间文化认同的符号，也是地区间非正式制度是否一致的考量，潜移默化、又深刻久远地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地理。可以从以下方面积极推进地区间的相互认知与信任：第一，持续完善营商环境，实行统一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第二，构建良好的、全方位的社会与经济合作平台，建立有效的经济协商制度和合作体系，增强地区间全方位经济互信；第三，进一步建立社会信用制度和信用公示平台，建立公共信用信息与企业信用信息共享整合机制，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

参考文献

- [1] 丁从明, 吉振霖, 雷雨, 等. 方言多样性与市场一体化: 基于城市圈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18, 53(11): 148-164.
- [2] 高超, 黄玖立, 李坤望. 方言、移民史与区域间贸易[J]. 管理世界, 2019, 35(2): 43-57.
- [3] 黄玖立, 刘畅. 方言与社会信任[J]. 财经研究, 2017, 43(7): 83-94.
- [4] 林建造, 辛自强, 范佳琳, 等. 中国省际双边信任模式及其形成机制[J]. 经济学(季刊), 2018, 17(3): 1127-1148.
- [5] 刘凤委, 李琳, 薛云奎. 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 经济研究, 2009, 44(8): 60-72.
- [6] 陆铭, 陈钊.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 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J]. 经济研究, 2009, 44(3): 42-52.
- [7] 吕炜, 姬明曦, 杨沫. 人口流动能否影响社会信任: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17(12): 61-72.
- [8] 饶品贵, 王得力, 李晓溪. 高铁开通与供应商分布决策[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10): 137-154.
- [9] 史宇鹏, 李新荣. 公共资源与社会信任: 以义务教育为例[J]. 经济研究, 2016, 51(5): 86-100.
- [10] 王艳, 李善民. 社会信任是否会提升企业并购绩效?[J]. 管理世界, 2017(12): 125-140.

- [11] 银温泉, 才婉茹. 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治理[J]. 经济研究, 2001(6): 3-12, 95.
- [12] 张维迎, 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 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 经济研究, 2002(10): 59-70, 96.
- [13] Bernard A B, Moxnes A, Saito Y U. Production Networks, Geography, and Firm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9, 127(2): 639-688.
- [14] Bigio S, La'o J. Distortions in Production Network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4): 2187-2253.
- [15] Bloom N, Sadun R, Van Reenen J. The Organization of Firms across Countrie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127(4): 1663-1705.
- [16] Bottazzi L, Da Rin M, Hellmann T. The Importance of Trust for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ture Capital[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6, 29(9): 2283-2318.
- [17] Chu Y, Tian X, Wang W. Corporate Innovation Along the Supply Chain[J]. Management Science, 2019, 65(6): 2445-2466.
- [18] 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9] Fort T C.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Domestic Versus Foreign Sourcing[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7, 84(2): 650-687.
- [20] Gui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Cultural Biases in Economic Exchang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3): 1095-1131.
- [21] Mcevely B, Weber R A, Bicchieri C, et al. Can Groups Be Trusted?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llective Trust.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Decision Sciences[R]. Working Paper, 2002.
- [22] Xing W, Zhou L A. Bilateral Trust and Trade: Evidence from China[J]. The World Economy, 2018, 41(8): 1918-1940.

作者简介

李建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师, 云山青年学者。研究方向为贸易地理、空间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

陈强远 (通讯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发展经济学。电子邮箱: chqiangy@126.com。

程玲, 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城市经济学。

黄丹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贸易地理、空间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

(责任编辑: 张 亮)